

抄本《理法器撮要》作者献疑

许 洁·石 云里

最近，朱维铮先生发现了一部题为“泰西利玛窦撰”，书名为《理法器撮要》（以下简称《撮要》）的抄本，并将之收到了《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中¹。该抄本共分三卷，第一卷是“理卷”，十五篇；第二卷是“法卷”，三篇；第三卷是“器卷”，十二篇。书末附一则署名“求自楼主人”的短跋：“右书三卷，图注精详，论诂明确，约而不泛，简而能明，询天文数学家不易得之宝也。戊寅初夏，借得汲古阁毛氏钞本，因令胥钞录一通，虽字迹绘工远逊毛本，然大意不失，尚可见庐山面目，爰书数语藏之篋衍。”不过朱先生对该抄本的作者问题还是存有一定程度的疑问，他在书前的简介里就认为：“这个抄本题原著者为利玛窦，卷一却有三篇述及用望远镜观测天体所得资料”，这些内容和卷一“经星数”篇所列恒星资料都只能是传教士邓玉函和汤若望来华以后传入的知识。因此，朱先生提出了关于本书原作者的三种假说：“一、非利玛窦撰；二、是利玛窦的未刊原稿，但掺入了后人添补的新知；三、是利玛窦未刊稿、后人所作利玛窦已刊译著摘要和明末传抄过程中后人添补的新知的缀合”。对于这三种假说，朱先生认为，由于求自楼转抄所据的毛氏抄本已佚，无从窥其原型，因此第一种可能性仅属假设。第二种推测是合理的，但不如第三种可能答案有说服力。也就是说，这虽然是一部缀合的著作，但是，其中却含有利玛窦的未刊稿和后人利玛窦已刊著作的提要。朱先生之所以要把该书收入《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原因就在这里了²。

利玛窦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抄本中果真有利玛窦的某种未刊著作，那对研究利玛窦和明末西学的传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朱先生在做上面的判断时，并没有给出任何可靠的证据和论证。他甚至也没有非常具体明确地指出，抄本中究竟哪些内容属于利玛窦的未刊稿，哪些是“明末传抄过程中后人添补的新知”。在这种情况下就将其收入利玛窦的译著集，虽然让该抄本得以重见天日，从而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以至会以讹传讹。例如，新近出版的《中国古天文仪器史》一书，在探讨明清

¹ 《理法器撮要》，《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 805 页，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 年

² 《理法器撮要简介》，《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 802 页，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 年

时期日晷部分的一些章节里，就大量引用了该书中的相关内容和朱先生的论断³，还直接把《撮要》看成利氏著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日晷书籍在明清时期的流传状况⁴。所以，很有必要对该书的内容作更加精细的分析，以对上述结论进行检验。

下面，我们分三个层次对该书内容加以分析。

一、与西学无关的内容

本抄本中与西学无关的内容基本上都集中在卷一“理卷”中，主要包括“原天”、“释藏天轮图”、“浑天图”、“量天测地法”、“日月交食”、“晷影一寸千里辨”、“星图”和“七曜行度”等篇。下面分别对此加以分析论证。

“原天”篇简要介绍了中国传统的浑天、盖天和宣夜三种学说，指出宣夜说“其说甚诞”，盖天说“亦扞格难通”，只有浑天说“其理圆，其迹合，故历代历家皆主其说”。其中在描述浑天说的周天分度时用的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度的度量制。全部内容与西学没有任何关系。朱先生认为这篇文字“很可能是利玛窦的未刊稿”，理由有两点：

第一，在“理卷”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劈头便逐一指斥中国传统的三种宇宙论，自然是因为三说均与被利玛窦奉作真理的同心水晶球模式不合，是在为下文宣扬水晶球模式的世界图像张目。

第二，此篇在利玛窦生前没有刊布，反而可证它很可能是利玛窦的未刊稿。

但是我们看到，此篇文字中，除了对盖天和宣夜两家有明确的批判外，对浑天说不但没有做明确的批判，反倒是作了某种形式的肯定。而且，自唐代李淳风的《晋书·天文志》开始，这种肯定浑天说而否定宣夜和盖天说的说法就已成了一种正统的观点，并非是利玛窦来华之后才有。

“释藏天轮图”篇，给出了一幅宇宙结构图，即所谓的“天轮图”，解释的是佛家的宇宙结构学说。其说明文字曰：“此图出《大藏》，乃西梵古制也。外为金轮、水轮、火轮，内为日、月轮，其梵字乃三十三天之名号，即天包地之象也。”我们知道，耶稣会士从一入中华就把佛教视为异教进行攻击。而这幅图所表示的所谓宇宙结构中，金星、水星、火星、太阳和月亮的排列次序也与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水晶球体系不同。因此，此文如果真是利玛窦的手笔，则他对佛经中的这种“错误”肯定不会保持沉默。

“浑天图”篇中有一幅浑天仪图，其解释文字曰：“浑仪之器始于汉代，肇于贾逵，制于张衡，加详于唐之李淳风，入妙于沈括，精于郭守敬。唐以前未大适用，唐后始精而用焉。今列图于左。”文字中没有只字提到西方浑仪。而从图上来看，所画的浑仪的型制也属于中国传统类型。

³ 潘鼐主编：《中国古天文仪器史》，第76~77页，238页，281~282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

⁴ 潘鼐主编：《中国古天文仪器史》，第281~282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

“量天测地法”篇讨论的是如何利用立表测影的方法来测定地径长度以及日地之间的距离，所用的方法与三国时代王藩在其《浑天象说》中所使用的方法完全相同⁵。这种方法不符合“地圆说”的基本假设，因此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徐光启在论述“地圆说”时曾经对“天圆地平说”及其王藩等浑天家所主张的测量天地距离的方法提出过批判⁶。但是，本篇作者则没有作任何类似的批判。

“日月交食”篇介绍了日月食发生的条件与黄白道交点之间的关系，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月行九道”的概念，只是在谈到日食的条件时，补充了一点西方知识：“西士云：日食必在日月经纬同度。若纬不同度，如日在北，月在南，经度虽同，日不食也。”

“晷影一寸千里辨”篇批判了认为南北距离与正午影长的变化之间存在线性比例关系的观点，通过历史上实测的影差与里差之间的数据关系的分析，指出影长变化与南北距离的变化之间“必不一律”，而是“影均则里差，里均则影差”，最后得出结论：“故《周髀》勾股法未尝以一勾为定例也。”粗看上去，这种批判可能是某位熟悉西学的人士所作，但是细致的分析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第一，早在唐代，僧一行已经根据实测数据对“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提出了批判⁷，所以这种批判并非西学传入后的产物；第二，批判这种观点最有力的论据是“地圆说”，但是，从抄本中给出的两幅影长变化图（图1，2）来看，作者在此所用的仍然为“地平说”，根本不像是出自一位“地圆说”持有者的手笔。

⁵ 关于该方法的现代讨论见：陈久金：“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中国科技史文集》（一），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陈美东：“《浑天仪注》为张衡所作辨”，《中国天文学史文集》（五），科学出版社，1989；王立兴：“浑天说的地形观”，《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四），科学出版社，1986；金祖孟：“浑天说的兴起和衰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四），科学出版社，1986

⁶ 徐光启：“徐太史地圆三论”，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647页，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

⁷ 《新唐书·天文志一》，《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714-718页，中华书局，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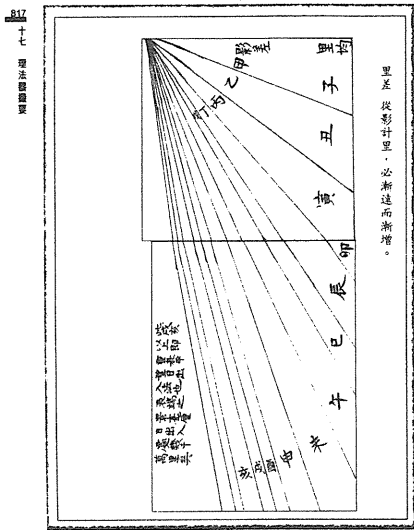


图 1 里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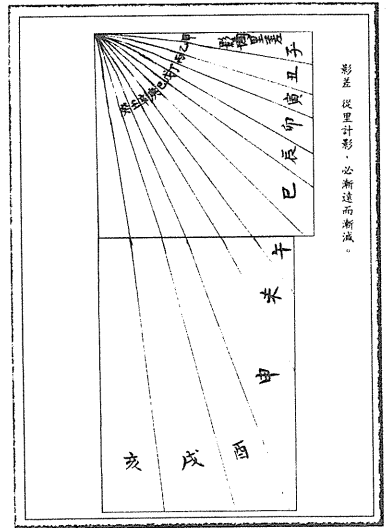


图 2 影差图

“星图”篇共展示了十九幅星图，包括一幅“紫薇星图”和十八幅二十八宿分宿星图，并在各宿图上给出了各宿的赤道距。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它们与《授时历》中的数据完全一样，而与受到西学影响的《明史·天文志一》中的数据相差甚大。另外根据《明史·天文志一》知道“(恒星)又有古多今少，古有今无者。……角宿中之库楼十星今八。亢宿中之折威七星今无。”⁸而本篇星图中的角宿中的库楼仍是十星，亢宿中也还画有折威七星，因此可以判断这些星图都是抄自西学影响前的作品。

“七曜行度”篇讲述了太阳、月亮、土星、木星、火星、金星和水星的运行速度和恒星周期，以及它们在一个会合周期中的动态。书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描述方式都属于传统范畴，例如，描述月亮运动时竟然还说：“太阴出入黄道内外，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各二道，而为八道”。按照西方天文学标准，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说法。另外，本篇给出的各天体的速度和周期都很粗略：对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要么说一日行多少度，要么说多少日行一度，而不考虑度和日以下的位移和时间单位；而对于月亮和三颗外行星的恒星周期，书中只精确到日（月亮）和年（土、木、火三星），对于金星和水星，书中则认为它们的恒星周期与太阳相同，为一年一周天。相比之下，利玛窦在《坤輿万国图说》和《乾坤体义》中只给出了日月五星的恒星周期，而且时间单位均精确到日以下的单位“刻”。总之，本篇除了第一句提到“宗动天一日一周”外，其它内容均属于中国传统天文学，与西学没有任何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理卷”十五篇中有八篇肯定不是利玛窦所作。而且，非常显然，即便

⁸ 《明史·天文志一》，《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 1246 页，中华书局，1976 年

承认这个抄本最早抄于明末，也不能说这八篇是“明末传抄过程中后人添补的新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因为，其中的知识都属于传统范畴，明末之前早已有之。

二、与西学有关但非利玛窦所作的内容

抄本中与西学有关，但却可以肯定与利玛窦无关的内容包括：卷一“理卷”中的“经星数”篇、卷二“法”篇的全部内容、卷三“器篇”中的全部内容。

“经星数”篇实际上是卷一最后的一个附录，其中将恒星分为六等，分别讲述了各等星相对于地球的大小倍数以及各等星的数目，最后给出了恒星的总计数目。其中恒星等级概念以及相应各等恒星相对大小的数据见于利玛窦《坤輿万国图说》和《乾坤体义》，但同样也见于以及《崇祯历书》、《明史·天文志》和南怀仁《灵台仪象志》等著作⁹。不过，各等恒星数目的统计数字则最早见之于《崇祯历书》、《明史·天文志》和《灵台仪象志》等书，而抄本给出的各等星的数目，与《崇祯历书》和《明史·天文志》中所给的数字都不相同，而只与南怀仁所给的数目相同¹⁰。因此，如果把这部分知识看成一个整体，则只能说它们来自南怀仁的著作，而不能说是来自利玛窦的著作。

至于“法”篇和“器篇”中的内容，朱先生认为：“法、器二卷确属利玛窦生前已刊或传授的应用数学和实测器械的著述‘撮要’，由收入本集（指《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的科技诸作与其略加比较，即可断言。”这一说法也缺乏根据，因为从《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的其他部分根本就找不到与这两卷相应的内容。相反，却可以找到这些内容的其他来源。

“法卷”，图形多，文字少，实际上介绍的是一些基本的几何学和三角学知识，共包括三篇内容。经过与明清之际诸多几何著作对比，我们发现，本卷的内容全部摘抄自梅文鼎的《三角法举要》、《勾股阐微》和《方圆幂积》等书，整卷内容基本上可以依次分为三个层次。

(1) 基本概念：首先介绍了点、线、面、体、三角形、角及三种类型的角（直角、锐角和钝角）等基本几何元素，对每种元素大都给出简单的文字定义或者解释，并配有相应的几何图形；然后介绍了与三角函数有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包括八种三角函数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和余割）的定义和角度的概念等。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部分内容全部来自梅文鼎《三角法举要》卷一“测算名义”。不同的是，梅氏所用的文字非常完备，解释非常详细，而抄本则仅包括一些关键性的文字，极其简洁，有些地方干脆就没有文字，只有图形。但是，梅氏书中的许

⁹ 《灵台仪象志》，《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七），第352页

¹⁰ 《崇祯历书》和《明史·天文志》中各等恒星的统计数字，见：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35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多其他内容,如“相似形”、“比例”和“论八线比例”(即三角函数关系)等内容,抄本中则没有论及,只含有梅氏书中介绍如何求解三角形时所用的“异乘同除图”以及梅氏在《三角法举要》卷一结尾“补遗”中为介绍圆周率而画的“赵氏割圆图”。

(2) 基本知识和算法:依次介绍了直角三角形和任意三角形面积、三角形内切圆和外接圆半径、直角三角内接正方形的边长等几何量的求法;讨论了正切函数的应用问题;其中的“通率表”给出了各种几何图形间的边、面积、体积的比例关系;“方圆幂积”术讨论的则是方中容圆、圆中容方,方边与圆径之比、方面积与圆面积之比;(等边)三角容圆、圆容(等边)三角,三角形边与圆径之比、三角形面积与圆面积之比;立方容球、球容立方,立方边与球径之比、立方体积与球体积之比。所有以上这些内容均见之于梅氏的《三角法举要》、《勾股阐微》和《方圆幂积》中,但抄本中这部分内容基本上只有图,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文字说明,有些内容如果不看文字说明是非常难以弄懂的。如其中的“第二法”和“三角勾股比例”两幅图,只有在看了梅氏书中的相关解释后,才会明白它们是用来证明三角形的面积公式的。

(3) 基本应用,主要是将几何知识应用于实际测量,包括有“隔水量田法”、“三角测深法”中的“测井之深及阔”和“登两山测谷深”、“三角测斜坡”法、“三角测远”法、“三角测高”法中的“自平测高”和“重测法”。抄本在这部分给出了五类十六种方法和图,但每幅图里仅给出了标题,没有任何对应的文字说明。同样的内容也可见之于梅氏的《三角法举要》卷五,但梅氏所介绍的方法的种类则要多得多,共计介绍了“测高”、“测远”、“测斜坡”、“测深”四大类测量方法,还附有“隔水量田法”和“解测量全义”,其中仅“测高”一类就介绍了十一种方法,给出了十九幅图,并且每种方法都作了详尽的解说。

总的来看,抄本中本卷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多少文字说明的图,而且各种图之间也显示不出多少联系。相反,这些内容在梅文鼎的著作里,状况就完全不同了,在那里,它们是作为一部完整著作中的有机部分而存在。《撮要》目前仅见一种抄本,仅仅根据这一抄本上题作“明泰西利玛竇撰”一句就认定该卷内容即为利玛竇所作,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由于梅氏的那几种著作都是他自己的手笔,所以,合理的结论只能是:《撮要》一书的第二卷是摘抄了梅文鼎著作中的一些内容而组成的。

卷三是“器篇”,也是以图形为主,仅附有少量文字。从它们提供的信息判断,该卷主要是讲述几种日晷的制法以及制作日晷所需的仪器和几何知识,另外还提到了中星仪的制法和用法。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制作日晷的辅助工具、几何作图法、日晷图法(即介绍日晷晷面线画法 and 日晷形制的图形)、中星仪等。

我们知道,利玛竇的确擅长制作日晷和各种测时仪器,并向不少中国学者进行过传授¹¹。但

¹¹ 利玛竇、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竇中国札记》第126、17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他有介绍日晷制法的书籍留存于世。这篇里的内容会不会是他的未刊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困难，因为仅仅从仪器制作方法上去研究，是得不出任何结论的。所幸的是，明清时期有关日晷和其它测时仪器的著作仍有传世者可资对比，其中包括：陆仲玉抄本《日月星晷式》（成书于1622之前）、汤若望校的《日晷图法》、罗雅谷著的《比例规解》、梅文鼎的《历算全书》、《数理精蕴》中的《比例规解》以及徐朝俊撰的《日晷测时图法》、《星月测时图表》和《定时仪器》（该三种书籍被同时收录在徐氏1807出版的丛书《高后蒙求》之中）、张作楠的《揣籥小录》和刘衡的《尺算日晷新义》等。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器篇”中的所有内容均可见于徐朝俊撰的《日晷测时图法》、《星月测时图表》、《定时仪器》三种著作之中，而与上面所列的其它著作基本不同，仅有“时刻盘”一幅图的内容，同样也可见之于汤若望校的《日晷图法》书后所附的“月晷”中。

制作日晷的辅助工具，抄本题为“利器九法”，给出了九幅图，每幅图都只有少量的文字说明，共介绍了九种器具，分别是规、矩、尺、度板（类似于象限仪）、节气板（作日晷晷面节气线的工具）、定偏尺（测晷面和子午面、水平面间夹角的工具）、定平尺（带有三个调节螺栓的水平基座）、平分尺、分厘尺。它们均可见于徐朝俊《日晷测时图法》中的“利器九则”，并且徐氏对每种器具的制法和用法均给予了详细的说明。

几何作图部分，抄本题作“总法五则”，介绍五种几何作图法，分别是：平分线捷法、平分圈度法、作垂线法、作引长线法、三点求（圆）心法。总共给出了五幅图，其中作垂线法、作引长线法、三点求（圆）心法只有标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平分线捷法虽有简单注语，但不涉及作法；只有平分圈度法有比较详细的作法说明。这些内容也全部可见于徐氏《日晷图法》中的“总法五则”，徐氏对每种作图法都给予了详细的说明，即使没有任何几何知识背景的人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仅看抄本中的这部分内容，则很难理解它要传达的知识。

日晷图法部分，抄本共给出了六幅图，分别是：面南地平晷、罗经平晷、平晷加节气法、面南天顶晷、东西晷、葵心晷。但图中只有标题，而没有任何文字解释。仅仅根据这些内容，是不可能懂得如何正确制成一个日晷的。相反，徐氏的《日晷图法》则中总共介绍了六类日晷、十六种制作方法，并且对每种方法都给予了详细的解说，抄本上提及的六种日晷制法均包括在其中，图形及其标识都完全相同。

中星仪部分包括中星仪表、中时盘式、测日躔表、时刻盘、定时刻线捷法，共有五幅图。其中只有中星仪表附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中时盘式和定时刻线捷法附有少量的文字说明，测日躔表和时刻盘只有标题，没有任何文字解说。中星仪表和中时盘式均可见于徐氏的《星月测时图表》，其中中星仪表的图形完全相同，文字表述上略有一些差异，但讲述的用法是一样的；中时盘式中

列出的四十五颗大星也与徐氏书中的所选的四十五颗大星相同。测日躔表见于徐氏的《定时仪器》一书中，实际是介绍如何测量太阳赤纬的方法，但抄本中却没有介绍具体的测量方法。时刻盘实际就是月晷（一种可以根据月亮的运动状况来测量时间的天文仪器），可见于徐氏《星月测时图表》一书中的“造月晷法”部分；定时刻线捷法的内容和文字则可见于徐氏《定时仪器》一书中，实际是介绍如何绘制简平仪上时刻线的一种方法，如果仅仅根据抄本上的这幅图和少量的文字，是根本无法了解这种作图法的含义的。

根据这些分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徐朝俊是看了该抄本后写成了《日晷图法》、《星月测时图表》和《定时仪器》三本书。可能的推论只有两个：第一，抄本第三卷“器篇”是抄自徐氏的著作；第二，抄本和徐氏著作均源自另外一种著作。目前，我们尚无法在这两种可能中作出取舍。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便是在第二种可能的情况下，也无证据表明，那“另外一种著作”就一定 是利玛窦所作。

三、摘自利玛窦著作的内容

《撮要》中明显属于利玛窦已刊著作摘要的篇章集中在卷一的“理卷”之中，依次是“天体”、“地体”、“天地相离远近”、“日月地球大小”和“七曜形体大小”。但有证据表明，这些内容也不是利玛窦自己所作，而是别人摘抄自他的著作。

“天体”篇首先简要描述了天的一些物理特征：如“天体浑圆，包乎地外……其形浑浑”；地之所以能“悬空而不偏坠”主要是因为天球内部“元气充塞，围注地心”；天球的质地“坚而且轻，有如葱头之皮，明而无色，层层通透光似玻璃”；天球共有九层，“最上面一层为宗动天”，自东向西转动，其他八层天球上，分别带着日月五星自西而东转动。接着，书中又介绍了基本的天球圈：如黄道和赤道，以及南北二极、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等，认为这些都是“古人因天定历，而各立主名，为推步张本”的。

在这些知识中，关于天球质地和层次的内容确定无疑是来自西学的，且见于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和《乾坤体义》。其余内容则带有明确的传统色彩，肯定不是利玛窦的手笔。本书作者在介绍天球质地的时候提到，这些事实是“西士航海，以远镜望之”而发现或者证实了的。但是伽利略改进望远镜并用于天文观察、发现新天象的时间是在1610年，利玛窦去世也是这一年，所以该文的作者肯定是此后的人。

“地体”篇主要介绍了地球的一些物理特征，如半径、周长和形状等，并且从天文角度论述了地体为一球形的道理。书中给出的地球直径（作者称之为地之“厚”，与利玛窦《乾坤体义》中所用的名词一致）为28636.36里，地球周长为90000里，与利玛窦《坤輿万国图说》和《乾坤体

义》中所给的数据相同，不同的是，在计算地球每度子午线的长度是，利玛窦的结果是 250 里/度，而作者的结果是 246 里/度。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利玛窦取一圆周 360 度，而抄本作者所取的则是 365.25 度，属于中国传统，明显不是利玛窦所为。

“天地相离远近”篇，介绍了西方水晶球体系中九重天的名称和每重天到地球中心的距离，所有数据与利玛窦《坤輿万国图说》和《乾坤体义》中的数据相同，所不同的是，利玛窦两部著作中对天球重数的计数是从内到外，以月球天为第一重，宗动天为第九重，而本书则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日月地球大小”篇介绍了太阳、月球、地球三者之间的大小关系，并对太阳大于地球进行了简要证明，证明方法是用水晶球体系为基础的：从地面看去，地球和太阳天球表面大圆都为 360 度，但是由于这两个球面的半径各不相同，所以两个球面上大圆的每度弧长各不相同；已知地球的直径，而从观测来看，太阳的直径为天度的半度左右，由此则可以估算出太阳的直径大于地球。不难发现，利玛窦在《坤輿万国全图》和《乾坤体义》中也讨论了同一问题，但是所用的方法与本书所用的不同，其基础是投影的性质：当发光体小于或者等于受光体时，产生的阴影是无穷长的；而从地影只能蚀近处的月亮而不能蚀远处的行星和恒星来看，地影肯定是有限的，所以作为发光体的太阳肯定是大于地球的；又从地影长度是有限的，而月亮却会发生全食的情况来看，月亮也应该是小于地球的。

“七曜形体大小”篇，主要谈的是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曜与地球大小之比，所提到的数据均见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图说》和《乾坤体义》¹²。但是在每曜大小比的数据之后，书中紧接着给出了用望远镜对该曜所作观测的结果。例如，对太阳则介绍了太阳在出入地平时“形如卵，边如锯齿”的状况，又介绍了其表面黑子的存在、数目、及运动周期（“每阅十四日周日之径”）；对月亮则介绍了其表面凹凸不平，“明处如山之高处，暗处如山之卑处”的状况。除此之外，还介绍了土星环（当时认为是土星附近的两颗卫星）、木星的四颗卫星及其与木星之间存在交食的情况、金星的位相变化，以及火星和水星“从远镜中望之，亦只此样，别无所见”的情况，经比较，所有这些内容与汤若望在《远镜说》¹³中的描述完全相同。

四、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撮要》第二卷的所有内容均摘抄自梅文鼎的相关著作。第一卷十五

¹² 《乾坤体义》，《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 607 页，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 年

¹³ 《远镜说》，《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八），第 373、374 页

篇中也只有五篇与利玛竇的《坤輿万国图说》和《乾坤体义》的内容有关，其他篇章都与利玛竇无关。即使是在五篇与利玛竇有关的内容中，也有四篇不同程度地掺入一些其他内容，表明它们不是利玛竇的手笔，而是后人的摘抄。卷三“器”篇的来源虽然无法最终推定，但同样无法认定它就是来自利玛竇。作为一个整体，该抄本明显完成于梅文鼎之后，而不是朱先生所推断的“明末”。书中有许多内容也明显属于传统天文学知识，在明末已经明显过时。综合所有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仅仅根据该抄本题名“泰西利玛竇撰”就认为其中含有利玛竇的未刊稿，甚至由此把该抄本整个归到利玛竇名下是不合时宜的。